



解决中国地方债应先改革银行

■ 邹至庄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教授

现在中国地方政府已积累了大量的债务。总量有多大? 债务是怎么来的呢? 为什么它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如果它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如何才能解决?

中国国民收入约为 48 万亿元人民币。地方政府债务估计约 14 万亿元人民币,或国民收入的 30%。中央政府债务占国民收入的 14.4%。因此,政府债务总额是国民收入的 44%左右。

与美国政府的债务对比这些百分比并不高,因为美国政府的债务占国民收入的 100%。大多数美国人认为国家债务问题不太严重。民主党不认为它是太严重的,而大多数共和党人认为它是比较严重的。与美国债务相比,虽然中国地方政府债务占国民收入百分比相对小,但其问题被认为是严重的,因为地方政府的还债能力不可靠,而且用债务拿到的经济资源都没有被好好地利用。

债务是如何来的呢? 地方政府借钱,是经过特别设立的单位代表他们借钱,他们使用国有企业从国有银行借钱。他们获得资金,通过出租土地来开发本地区。当地方政府要资助指定的行业时,如太阳能,也使相关行业的企业能够借款——但这样的借款是有风险的。

为什么这些债务是一个严重问题? 首先,如果还款不可靠,便会破坏了当地政府的信用,使地方政府在未来很难借到需要的钱。其次,这些债务还会破坏中央政府的信用。第三,如果贷款不好好地利用,会浪费经济资源。另一方面,如果贷款被好好地利用,用于基础建设,如高速铁路,还可以帮助防止全球金融危机。第四,从银行借来的债务,导致银行坏账增加,使得银行体系不稳定。

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有人建议,中央政府应严格地控制地方政府的债务。事实上,中央政府已经做过了。最近,国家审计署决定审核地方政府欠下的债务,但是有人怀疑中央政府的控制是否有效。

由于所有的贷款是从银行借来的,更有效的解决方法是改进银行体系的运作。中国从 1978 年开始经济体制改革,但其银行系统还没有好好地改革,有时依然会从政治和行政立场,而不是从经济立场向国有企业放款。允许银行相当自由地发放贷款是不明智的。为了解决银行不良贷款和地方政府坏账问题,必需限制银行的贷款能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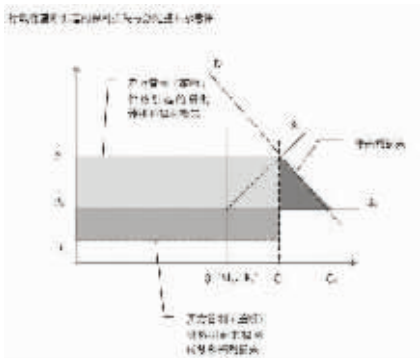
中国的银行应当财政独立,由央行监管。财务独立,要使银行的工作人员慎重考虑他们的利益和损失。容许过量的贷款会令银行受到金融风险。为不妥当的项目发放贷款,会减少银行和它的工作人员利益。用经济学的说法,银行应受到预算硬约束。上面说工作人员的利益,十分重要,不然,他们会根据人事关系放款,银行亏本也没有关系。避免这种行为的方法之一是规定银行发行股份,多数股份由公众拥有。持有股份的人选举管理银行的董事会来控制银行的经理。

在一个运作良好的银行系统,中央银行或其他管理金融当局可以调节商业银行持有的储备金,还可以限制商业银行贷款的金额。这样的银行系统会帮助银行有效地分配财政资源,考虑银行雇员的损益,也会使中央政府实施货币政策以调节宏观经济,减少经济的波动,也将减少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的坏账,使之更有效地使用经济资源。

垄断国企与经济滞胀

■ 盛洪 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教授

最近两年,我们对国有企业和行政性垄断的研究,得出了垄断国企不仅无效率而且不公正的结论来,还有一些副产品。比如,我们对行政性垄断带来的社会福利损失进行了估计。这包括三个部分,即“社会福利损失一”,因垄断导致的社会生产的减少;“社会福利损失二”,垄断高价带来的损失;和“社会福利损失三”,垄断低价带来的损失。直接地,可看下面的图示。



【说明:图中深灰色部分是行政性垄断带来的社会福利净损失,我们称之为“社会福利损失一”;图中浅灰色部分是由垄断(管制)价格带来的分配扭曲部分,我们称之为行政性垄断的“社会福利损失二”;图中灰色部分是买方的垄断(管制)价格(即较低或零的资源价格)带来的分配扭曲,我们称之为行政性垄断的“社会福利损失三”。】

所谓“垄断高价”,是指企业垄断了销售市场,以高于竞争性市场价格的价格出售产品。所谓“垄断低价”,是指企业拥有排他的特权,以低价甚至无偿地获取和使用这些占有稀缺的生产要素,如土地、资金,或开采权。

我们对 2010 年的数据进行了搜集和处理。我们估计,仅在银行、石油、电信、铁路和食盐等五个垄断行业中,行政性垄断带来的社会福利损失就高达 19104 亿元。这个数字的宏观经济含义何在呢? 我们知道,社会福利损失一的含义是,假如没有行政性垄断,这一部分本是可以实现的社会产品;社会福利损失二的含义是,相当于这部分的货币本

来可以购买其它竞争性产品;社会福利损失三的含义是,如果垄断企业低价或无偿占有的资源由其他企业按市场价格购买,就能创造出相应的社会产品。总之一句话,如果没有行政性垄断的存在,我国经济本来可以增加这 19104 亿元的社会产品。用 2010 年的 GDP 总量 397983 亿元除之,约为 4.8%。也就是说,握有行政性垄断权的国企的存在,使我国经济增长速度下降了 4.8%。

我在 2006 年的一篇文章“巨国效应:中国还会有几十年的经济高速增长吗”中提出,我国还有二三十年的经济高速增长长期。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我国的城市化过程还没有完成。2006 年时,城镇化率只有 44.3%;到 2011 年,也只有 51.3%。而城市化的目标,一般要达到 80%以上。按每年城镇化率提高 1.2 个百分点估计,完成这一过程还需二三十年。

而城市化意味着巨大的需求。首先是城市基础设施和市政公用事业的投资需求。根据 2003 年的数据,这一投资需求的人均水平已达 22305 元,而近十年每年新增的城市人口约为 2000 万人,仅这一项投资需求当年就达 4000 多亿元,到现在应有每年万亿元之巨。更何况,进城的还要住房子,房子里还要配有家具电器,因而一个进城人还会创造 10 万元以上的投资与“设备”需求。

除了投资需求,一个进城的人还会带来消费需求的永久增长。首先是“城市物业费”。一旦进城,就要交纳包括电费、水费、燃气费、取暖费、电话费、宽带费、垃圾处理费和污水处理费,加上养路费、汽车保险费、停车费和物业费等等。我在“城市化时代”一文中估计,一个北京中产阶级家庭每年的“城市物业费”应在两万元以上。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1 年城镇居民平均每人支付“交通通信”和“水电燃料和其他”费用,即近似的“城市物业费”约达 2991 元,以 2000 万乘之,约有 600 亿元之巨。更何况,进城的农民收入会有较大提高,生活方式也会改变,购买商品也比在农村便利得多,因而会产生出明显的消费需求增加。这些需求,都是城市化会带动经济高速增长的基本动力。

如此看来,自 2010 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长速度明显放慢,从 10.4%降到今年上半年的 7.6%,并非因为经济增长失去了需求动



力,而是另有原因,这就是前述垄断国企的存在。因为垄断国企占有了全国资源的很大一个比例,却不能提供对应的产品与服务,国有企业和行政性垄断的问题就不再是原来认为的微观的企业层次的问题,或中观的产业层次的问题,而是对宏观经济有着显著影响的问题。

实际上,垄断国企的存在不仅减慢了经济增长速度,而且带来了通货膨胀的压力。如前述的垄断高价带来的损失部分(社会福利损失二)和垄断低价带来的损失部分(社会福利损失三)共约 16169 亿元(2010 年),其性质,就是一笔没有提供相应产品和服务的货币收入。而这笔收入必然是其它产品的购买需求,因而会带来这些产品的价格上涨。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一个社会上有 10 个人,每个人生产 10 个产品,并以每个 10 元卖掉。每个人的收入是 100 元。现在其中一个人垄断了稀缺的必需产品,他把价格涨到 20 元,并不增加产量,他的收入就变成了 200 元。而别人为了买他的垄断产品,就必须多付出 10 元,而少 10 元购买别的产品。这时,如果别人的产品都是竞争性的产品,价格可上下波动,若要达到供求平衡,这些产品的价格就会下浮 11.1%。与垄断产品涨价 100%相抵消。然而,事情还没有完。垄断者可拿着多得的收入 100 元购买别人降了价格的产品,这又会使这些产品的价格上升到原来水平。考虑到垄断产品价格涨了 100%。所以这时产生了一个通货膨胀率约 10%。其根本原因,是垄断者因多得了收入

而加快了货币的流动。

垄断低价的例子也类似,就不再细说了。如果将垄断高价的损失和垄断低价的损失 16169 亿元与当年平均的广义货币供应量(M2)674955 万元相比(假定货币周转速度为 1),可知其所带来的通货膨胀压力约为 2.4%,这相当于商品零售价格指数上涨率的 78.7%。因此,垄断国企的存在又是一个滞胀因素,使得宏观经济政策面临两难困境:既要刺激增长,而要避免通货膨胀。而这正是我国目前所面临的问题。

更进一步,我们要注意,垄断国企并不是在某一年产生滞胀作用,而是每年都会发生复利作用的“滞胀器”。也就是说,它的存在会使我国经济增长持续下滑。这种下滑不仅是按某一指数的匀速下滑,而是当越过某一临界点时,会加速下滑。并且,当出现经济低迷的情况时,垄断国企因其拥有的政治资源,会更加强化其利益的刚性,利用行政性垄断权进一步盘剥社会上的其他利益集团,如提高垄断价格,更严厉地排斥其他利益集团进入他们的“领地”,导致经济的进一步恶化,以及不同人群之间的紧张与对立,甚至会导致社会动荡。

因而,改革国企和打破垄断到现在已不是可以缓行的改革,而是迫在眉睫;也不只是涉及几家企业或几个产业的改革,而是关系到宏观全局,以至中国经济前景的关键性举措。反过来说,推动国企和垄断产业的改革,不仅会收到市场化改革的好处,而且能收到促进宏观经济长期健康发展的巨大功效。

热视角

贾康:房产税扩大试点范围势在必行

■ 高伟

8 月 15 日,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在参加“2013 博鳌房地产论坛”时表示,房产税扩大试点范围势在必行,但是不能针对所有住房进行普遍征收,而应该将“首套房”等基本住房群体排除在外。

据经济参考报报道,事实上,自今年初“国五条”强调将适时扩大房产税试点城市以来,相关信息一直备受业界关注。贾康认为,尽管房产税改革举步维艰且争议不断,但是从中央决策层到具体的综合管理部门,都非常明确地表述了关于适时扩大房产税试点范围,或者推进房产税改革试点的要求,所以房产税试点城市扩容是势在必行。

但他同时强调,我国的房产税或者房地产税改革在可以预见的历史时期之内,绝不能简单照搬国外模式,而要更多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应该“调节要端”,而不是普遍征收。“在以后的税制框架里面,基本住房保障概念下的第一套房或者第一个单位的住房是不被这个税覆盖的。”

针对业内存在的关于房产税的一些争议和误解,贾康表示,房产税的征收应当符合人们的普遍诉求,除了保障基本住房群体的前提以外,还应该通过相应程序,使其法制化、民主化,最终把各个年度内地方辖区的房地产税相关规则透明化。“让地方所有的人都参

与、都知情”,让老百姓明白“这个钱集中起来以后,通过政府之手怎么样回过头来满足大家的诉求”,如此一来才能催化当前的试点区域,以及适时扩大征收城市范围。

在总结上海、重庆两地的房产税改革试点结果时,贾康认为这两个城市已经显现出一系列的改革成效。他同时表示,“当前市场上关于某些城市已经确定为扩容试点城市的传闻都不准确,一定要等有关管理部门正式宣布”。

记者了解到,业内有消息称,杭州已经被确定为下一个房产税改革试点城市。据悉,按照杭州市政府上报,并经住建部、财政部、国税总局审定会签的房产税试点征收实施方案,杭州将采用对增量房屋征收房产税的模式,在此基础上划定人均 60 平方米的免征面积,按照家庭为单位综合计征。

李连仲:做到金融城镇化

8 月 10 日,中国金融办工作协会会长李连仲出席 2013 中国城镇化与企业家论坛。该论坛由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新京报社共同主办,聚焦新型城镇化给企业家带来的机遇与挑战,共话城镇化发展趋势与前景,探讨城镇化的空间投资战略、产业投资战略、新型商业模式,共同推进新型城镇化的健康发展。

参与本次会议的专家与领导有:国家发

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李铁;中国金融办工作协会会长李连仲;新京报社社长戴自更;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裴长洪;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江苏如皋港区党工委书记吴志华等。同时以上几位领导做了主题发言。

特别是李连仲会长围绕三点在会上发言很特别。他说,一是做到金融城镇化。现在我们的金融没有城镇化,从计划经济传承下来,我们都是为大项目服务,城镇的金融应该是为中小企业、小微企业、个人账户服务,需要大量的小银行、民营银行。民营银行和小银行发展的和我们的要求不一致。所以说你的金融没有城镇化,你说你有银行,那是大的银行,那是从计划经济延续下来的,你的金融城镇化要解决什么,一个是小微企业的融资,还有一个是居民的消费信贷,再就是城市的建设,通过社会资本参与来推动社会各方面发展,包括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所以说金融要城镇化,我们的金融和城镇化发展的要求距离很大,再就是财产要城镇化,农民要进城,农民兄弟在农村这么多年,进入城市应该以什么身份进城,应该以有产者的身份,他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所有权应该转化为财产,如果以无产者进城,他的劳动成果哪去了,所以要把这些变成财产,变成资本,给农民进城增加经济基础。使他有购买保障房,租用经济适用房,廉租房

创造条件。

二是要做到生态城镇化。我们的生态,特别是 PM2.5 指标出来以后,怎么保证人的身体健康对工业污染占大气污染的 70%,所以城市生态是当前突出的问题,特别是现在,雾霾很严重,所以说要保证城市生态化,使生态成为城镇化的重要内容,要发展环保产业,现在我们的净化器,普及率家庭不到 1%,外国已经达到 25%,刚才说了企业在城镇化发展什么,不要仅仅发展房地产,空气净化现在很畅销,去年增长 14.7%,今年有望突破 15%,所以环保产业发展推动生态城镇化。

三是要做到智能城镇化。把智能管理,信息化和城镇化发展结合,智能交通,智能保健,我们的信息产业要和城镇化发展结合,特别我们提出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当中,要提高信息消费的分量,把它作为新经济增长点,智能城市化正好符合这个战略要求。

再就是我们的价值城镇化,说你的价值观点,我们的农民兄弟进城以后,价值观点要发生变化,他是城市主人,要对城镇的发展目标意见,还要行使主人翁的权益,还要主动的接受新技术岗位的培训,所以价值观念的城镇化,我们做的也很落后。

总之,我们要以人性为核心的城镇化,实现我们的经济金融为产业服务,为中小微型企业服务,为消费服务,为提高人民幸福指数服务,真正达到我们的伟大中国梦和结构调整的结果。

顾泛珠三角区域合作以来取得的成效,探讨新的合作背景下贵州省区的新谋划、新发展,并从多角度提出深化泛珠合作的有效方法和路径。

针对泛珠三角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与合

作的重大问题,与会领导和专家学者进行广泛而深入的理论研讨,交流分享研究成果,共同为深化泛珠三角区域发展与合作、促进贵州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出谋划策,提供理论支持。

(袁天志)

论坛聚焦

2013 年泛珠三角区域合作与发展社科专家论坛举行

8 月 20 日,2013 年泛珠三角区域合作与发展社科专家论坛在贵阳举行。贵州省政协副主席蔡志君出席论坛会并讲话。

来自“9+2”各省区社科联、高校和澳门基金会的 50 余名领导和专家学者,紧紧围绕“深化改革开放、促进合作发展”这一主题,回

全球专家智库论坛畅谈能源安全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的全球能源安全智库论坛日前在北京召开。与会专家认为,没有一个国家可以脱离世界来保障自己的全部能源供给,解决能源问题的关键在于各国相互间的信任与合作。

论坛的研究报告中提到,化石能源是可耗竭的,但目前为止,石油、煤炭、天然气等传统化石能源还没有表现出显著的产量下滑现象,深海油气、非常规油气资源的逐步

发现和投入商业化生产显示出投资与技术突破对于保障能源供给还有很大的空间。在未来的 20 年至 30 年,传统资源储量还不至于成为能源安全的瓶颈。但与会专家一致认为,维护能源安全,推广新型低碳能源消费模式已刻不容缓。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杨认为,在深度全球化的今天,只有全面提升各国之间的合作水平,才能实现广泛的共赢。

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所长李平也表示赞同。他表示,能源安全是全球共同面临的问题,解决全球能源安全的关键在于相互沟通、信任与合作。

国家能源局总工程师杨昆表示,推动低碳技术应用、发展循环经济、实现绿色发展,是中国政府保障能源安全、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政策。中国高度重视页岩气带来的新变化,已制定页岩气“十二五”发展规划,力争让页岩气成为提升中国能源安全水平的一个新契机。

李平指出,随着全球化趋势和技术扩散

转移,中国将有能力拥抱页岩气革命带来的机遇。

国际能源署前署长田中伸男认为,页岩气革命将对全球能源市场带来巨大影响。美国将因此一跃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和天然气生产国,从而极大地减少对中东石油的依赖。相反,到 2035 年中国、印度、日本及欧洲等对石油和天然气的进口依赖度将进一步增强。他还建议,中日韩等重要的亚洲天然气进口国应合作建立亚洲天然气价格体系,以增强进口议价权。

(杨斯阳)